



张俊彪

刘俐俐

理论视野中的作家

花城出版社

理論視野中的作家張俊彪

刘俐俐 著

廣東文學節辦公室主編

粵新登字 05 號

理論視野中的作家張俊彪

劉俐俐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州市環市東路水蔭路 11 號)

廣州市新華書店經銷

廣州紅旗印刷廠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開本 10.375 印張 240000 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ISBN7-5360-1992-0

I·1693 定價 10.40 元

献 辞

陈国凯

举办广东文学节是个创举！

提倡文人有文，文学有节；反对文坛上的庸俗作风和市侩主义！

在严肃文学困坐愁城，低俗出版物得意扬眉之际；当文学圈子还咀嚼着个人小小悲欢吁长嗟短之时，广东文学节着力组织广东作家面向时代、面向社会、面向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认真撰写作品，并筹资将数十本反映现当代生活的作品一齐出版推出，不失为一种壮举！

时代呼唤文学；文学呼唤正气；文学呼唤大风之歌！

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写在广东文学节的旗帜上，写在广东作家们的心坎里。

文学之树长青！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目 录

绪 论	(1)
一 确立这个选题的原因	(3)
二 确立这个选题的意义	(8)
第一章 先在意向结构的理论展示	(15)
一 “母亲意象”及其特征的意义	(17)
二 “父亲意象”及其特征和意义	(28)
第二章 审美情感与创作意识	(38)
一 苦难意识	(39)
二 叛逆意识	(49)
三 自我肯定意识	(56)
四 泛神意识	(62)
第三章 文学观念的理论剖析	(68)
一 小说观念的理论剖析	(69)
二 传记文学观念的理论剖析	(93)
三 特区阶段文学观念的理论剖析	(102)
四 世纪之交的文学精神	(113)
第四章 主题投向的理论剖析	(132)
一 农民问题	(132)

二	历史问题·····	(171)
三	人生问题·····	(212)
第五章	文学风格与艺术探索·····	(226)
一	文学风格的形成·····	(226)
二	语言探索·····	(229)
三	人物探索·····	(247)
四	创作原则和艺术手法的探索·····	(259)
第六章	理论视野中的价值展示·····	(266)
一	以对人类珍贵而美好情感的准确而真实的记 录,丰富了人类情感的库存·····	(267)
二	永久的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	(275)
三	风特长宜放眼量:重新认识文学的活力和社会 价值·····	(280)
四	永久的审美价值·····	(285)
第七章	几个理论问题的提出与探索·····	(288)
一	作家与题材的关系·····	(288)
二	使命感、责任感与艺术表现力的关系·····	(298)
张俊彪小传	·····	(303)
张俊彪著作系年(1971—1994)	·····	(305)
后 记	·····	(328)

绪 论

《理论视野中的作家张俊彪》是一部跨文艺学与当代作家研究两个学科的学术专著。新时期以来的文坛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许多青年作家，他们掀起的文学雄风掀起文坛上一股股文学的潮流，形成我们时代最为奇特、纷繁复杂的人文景观之一。这无疑为文艺理论的丰富、为文学批评的总结提供了坚实的沃土和条件。文学理论告诉我们，文学史的总结尤其看重的或者说依据的不是数量上的作家，而是具有独特现象意义、另辟蹊径的作家。也许，这样的作家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因为他们的独特创作道路、艺术追求和人生总结启示了理论家的另一种思维领域，唤起理论家作别一样总结的渴望，从而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使自己不仅具有了文学史意义，同时也具有了文学理论意义。笔者就是立足于这样的思考，将著名青年作家张俊彪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的。我知道，这是个难度极大的选题，其原因在于，第一，我面对的是一位创作甚丰，而且创作力正值旺盛，频频显示其爆发力的作家。虽然年轻，可是他的创作道路已走了20余年。在任何理论批评面前，他与他的作品都永远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永远的绿色。他逼迫理论家以全新的视角、深刻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来驾驭他，梳理他。可以说，他是位向理论

家挑战的作家。第二,张俊彪丰厚的创作和独特的人生道路早已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在他向文坛向人类奉献出每一部新作时,都曾引起评论家们的注意,关于他的作品曾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评论。更有陕西咸阳师专的教授、评论家韩梅村先生的学术专著《多棱透镜下的人生——张俊彪论》于1992年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正如李若冰在《韩梅村的评论现象》一文中所谈到的: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评论家象韩梅村这样,对一个青年作家及其作品饱蘸笔墨,进行如此悉心入微的观察和剖析。这反映在他写的中国西部青年作家张俊彪论:《多棱透镜下的人生》中,洋洋洒洒20多万字,从书中不仅清晰地看到张俊彪其人,也能见到韩梅村自己,达到了评论家和作家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的程度。

韩梅村的研究具有自己的角度和特色:“他纵观张俊彪的全部作品,除对其长篇传记文学作重点论述以外,还从诸如散文的视角、小说的视角、诗歌的视角、屏幕文学的视角,追踪其创作的足迹,进行了全方位的艺术探讨。”^①就是笔者自己,也曾追踪张俊彪多年,熟悉他的创作道路和创作结晶,曾先后发表过论文《依恋黄土地的张俊彪》、《充分发掘人生的作家——张俊彪创作论》、《深沉的历史回顾勇敢的艺术再现——评〈鏖兵西北〉》、《充满感情和理智的心灵总结——读张俊彪自传体小说〈没有陨落的太阳〉》、《真情质朴韵味悠长——读中短篇小说集〈一篇未讲完的故事〉》等多篇。这些论文记录下我对他的理解和艺

① 《文艺报》1992年6月20日。

术创作的心得。上述一切,既给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带来方便,更带来难以逾越的高度。如果继续选择这位不断向理论家挑战的作家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就需要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采用全新的视角,从宏观的理论层面来加以观照自己的研究对象。丁尼生在《悼念》中写道:“人们可以踏着由他们自己死亡的去积累起来的台阶,逐步上升到更高的境界。”西方人还这样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已有的研究成果应该成为新研究的阶梯和基础,给我确立新的研究选题以力量和勇气,《理论视野中的著名作家张俊彪》就成为关于文艺学与当代作家研究两个学科相交叉的一个新课题。

一 确立这个选题的原因

独特的选题来自独特的研究对象。张俊彪作为新时期涌现出来的青年作家,有他的独特之处。

他出生在甘肃正宁县农村。这是陇东——六盘山之东,面积几近台湾省那么大的—片黄土高原,以土层深厚而出名,以农耕文明历史久而著称。周之先祖在此发迹,西王母在此降生,人类石器工具在此首先出土……这是一片既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又有着革命历史印迹的土地。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浑厚、坚韧、礼仪耕读的基因顽强地渗透于陇东人们的血液中,影响人们的心性、品格和气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惰性、自私、保守和狭隘也沉淀于人们的言谈举止之中,成为酿成复杂的人际关系、错综交织的各种心态的诱因。但是,对于张俊彪来说,还有第三方面的客观环境,那就是得天独厚的老区环境,使作家从小就受到革命传统熏陶,受到众多革命英雄人物动人故事的反复催化。这样的环境和人文影响是能够培育出具有特殊才能和品格的人物

的。他的出生也颇具传奇色彩：1951年阴历9月27日，正当午时，在田地里劳苦了半天的母亲，回家给老黄牛垫圈时，将他过早地生在了牛圈里。他成了牛圈娃，一来到这人世间，便与泥土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又在苦难和艰辛中度过童年，走向青年，走向外面的世界。他的文学创作的起步和发展与他的童年、青年的苦难经历息息相通。或者说，他没有让苦难和艰辛白白折磨自己，而是将这种人生经历视为一笔财富，一个可以衍化为文学艺术的生活宝库。他用浓浓的文学情思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反复地观照这个宝库，于是一位经历和题材选择都非常独特的作家就诞生了。

他的独特创作道路是迥异于其他青年作家的。新时期以来最早形成伤痕文学潮流的一大批作家和作品，着眼于动荡的十年浩劫给人们造成的肉体的损害与精神的创伤，或哀婉地抚摸、低吟身上的疤痕，抒发忧伤愤慨的情怀。《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丛维熙的大墙文学系列等一批小说除了写边地人民的苦难，更抒写了主人公令人悲伤的苦难史。他们在揭示苦难的折磨下人的变形、道德的松弛乃至堕落，并以此为线索，追究出那造成它的更大范围的荒谬来。同时，虽然他们的小说世界中劳动人民的品德和气质得到了较充分的艺术表现，但是，小说中流动的主导情绪却是属于落魄的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忧虑、苦闷和心灵创伤的表现和抒发是创作的出发点，劳动人民的品德和气质不是作为艺术本体而是作为知识分子心灵的陪衬出现于小说中的。其次，是居高临下的精神审视。落魄的知识分子和西部底层社会的筋肉劳动者们，文化心态上的互相认同是相对的，不同的文化根基引发的冲突则是绝对的。在冲突的始终，劳动者都处于不自知的盲目状态，知识分子处于自知、理智的状态中，从而表现出居高临下的精神审视特征。张俊彪的创作无论从

立足的角度、情感倾向还是艺术追求的思路都与这一文学潮流迥然有别，他与劳动人民不存在审视抑或认同、冲突的关系，他原本就是陇东土生土长的作家，西部底层社会生活与他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他的情怀抒发是出自于包括自己在内的底层人民的，他的理性反思是包括面对自己的整体性的，他的自觉程度是标志着从乡土中走出去的一代青年作家水平的。新时期文学发展到80年代中期曾出现过知青文学潮流与寻根文学潮流。知青文学的情思产生于那些由城市文明进入乡村文明又从乡村文明返回城市文明的人们。当年这些知青们带着经受过城市文明熏陶的灵魂来到草原、荒漠、深山、乡村，默默地承受着辛苦劳作的煎熬，平息了内心绝望的狂躁，适应了纯朴的乡亲们粗糙但善良的感情，尽管有了城市文明的参照系，他们发现了农村还保留了那么多令人遗憾的封建遗迹、野蛮和愚昧，然而他们毕竟向农村文明认同了。他们为农村纯朴的人性、野性的力量所折服，正如张承志在作品中写到的：“在逆境里，在劳动中，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在思考痛苦，比较和扬弃的过程中，在历史推移的启示里，我们也找到过真知灼见；找到过至今感动着甚至温柔着自己的东西。”^①若干年后，当他们带着泥土气息和粗糙的灵魂归来时，这些罗漠斯们以乡村纯朴文明为参照又一次认识城市时，他们发现一切都不如意，不发达的城市生活中私欲横流，商品化、市民化潮流……他们感到一种莫大的失望，好象有一样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突然间破裂了。他们深感痛苦，这痛苦衍化为文学，就有了那乡村中知青劳作的身影，神奇土地上的情感纠葛和乡村孩子王的辛酸与失落……张俊彪不属于这股文学潮流，他始终脚踏陇东故乡的黄土地，挣扎在饥饿、受欺与自强

①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刻在心上的名字》。

不息的人生道路上。他没有知青作家们那种“边缘人”的感受，没有那种游移于两种文明间的惶惑，这就决定了他更深刻地走向总结自己与黄土地上的传统文化，探寻自己的人生追求。他与寻根文学也不相同，当韩少功、阿城、郑万隆等一些青年作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讨论如何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在文学中探寻我们的“根”的问题，当王安忆以她的《小鲍庄》的捞渣回眸传统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时，当韩少功借助丙崽探寻停滞不前的文化氛围中永远长不大的民族性格时，张俊彪显然没有加入这部“寻根”的多声部合唱。此时，他正将目光凝聚于董振堂、刘志丹、解放大西北战场的刀光剑影、英雄气概之中，他在努力从革命历史中挖掘出美的韵味，探寻其深刻的规律来。至于后来的新潮小说、先锋派们的作品，重视小说观念的革新、关注小说的过程而非观念、思想，追求设计独特的叙述圈套，创造奇幻无比的故事空间；将目光投向追溯家族的隐秘历史的雾霭之中，就更与张俊彪的路数相异。这样，张俊彪就将自己与新时期的一个个文学潮流拉开了距离，他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文学潮流的代表，他平心静气地设计好了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以至时至今日的理论批评，在蓦然回首之间发现了他这独特的文学道路尚未被很好地总结，这不也是理论批评的缺陷吗？

原因之三在于，张俊彪的创作，就形式而言，主要是传记文学、长篇小说、散文。就题材而言，主要有两大类，其一是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人生、世事为原始素材的人物传记和长篇、儿童小说。散文集《牛圈娃》，长篇自传体小说《没有陨落的太阳》，自述文集《我走过的路》，散文集《神泉》等可属这一类。其二是以革命历史题材、革命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创作。长篇小说《山鬼》、《最后一枪》、《血与火》，长篇报告文学《鏖兵西北》是游离于这两大类题材之外又与这两类密不可分的力作。显然这是一位以个人经

历为主要文学创作源的作家。在新时期文坛上,这样的作家的确不多,但是在中外文学史上却屡不鲜见。我国当代文学中的《高玉宝的故事》和作家高玉宝,苏联文学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与张俊彪有相似之处。这类作家大都有着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重人品对文学的影响,以人品为文品的依据。胡风在《胡风评论集》中曾这样写道:“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底场合,从神圣的人生产出了艺术,虽然就是没有这艺术也无损于他底伟大。”^① 就是象英年早逝的路遥,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也在颇大的程度上依赖他个人的经历和体验。这类作家的人生道路与创作的诸方面关系作为理论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同时,张俊彪在文坛上最早提出传记文学的主张,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各界人杰,各方英豪,多如繁星,但传记文学实在是太少了。传记文学的题材领域是极其广泛的。”“作家必须适应社会的环境,满足社会的要求,否则就要被淘汰。”^② 独特的人生道路与传记文学的结合,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理应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任何新的写作形式、文学形式的出现,都与社会生活内容、方式的变化有关。例如在美国,60年代,文学界和新闻界出现了几种介于小说与新闻之间的写作形式。这些形式的作品都可称之为“非虚构文学作品”。主要有“新闻报道”、“非虚构小说”、“历史小说”。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激增,标志着人类写作活动的一个重大转变,即从传统的艺术虚构写作转向现代的纪实写作。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写作方法已难于反映当代这个繁杂快节奏的世界了。真实生活的生动性有时超过了虚构故事的魅力,人们变得越来越喜欢看杂志文章,喜欢

① 《胡风评论集》上册第395页。

② 《我与我的传记文学》,原载《飞天》1985年7期。

看真实的故事。美国的 60 年代是一个社会激变的年代,这就是为什么非虚构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尤其丰盛的原因。如果说上面所述是美国 60 年代文体变化的原因,那么,生活于中国西部土地上的张俊彪将自己与传记文学联系在一起,并坚信:“不论我将来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去寻求自己的立足存身之地,但是,我与我的传记文学,以及我自己所走过的这一段文学之路,是属于我自己的,也只能永远属于我自己。”^① 他的创作实践和艺术体验,正是探索传记文学在当代文坛兴起的一个重要线索和典型例证。

二 确立这个选题的意义

《理论视野中的作家张俊彪》这个选题是文艺学与当代作家研究的新课题,那么,它的意义就必然是超越作家个体而且是超越地域民族的,必然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第一 实践意义。

如前所述,张俊彪的创作道路是迥异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新潮文学的,他走的是自己独特的文学之路。他创作的传记文学固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他的自身经历与创作的血肉联系,其间的深刻规律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这笔精神财富的整理和总结,对于许多在文学的道路上蹒跚地前行的后来者,无疑具有启示和激励意义;对于丰富人类的情感宝库的库存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一个人就是一部历史,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历史有着某种相通之

^① 《我与我的传记文学》,原载《飞天》1985 年 7 期。

处时,意识到自己心灵需要总结,而他又具有文学情思的时候,自传体的作品就会产生。如张俊彪的《没有陨落的太阳》就是这样诞生的。但是,我们知道,当代社会生活的脚步快捷而匆忙,在奔波中我们会不经意地踩碎许多人类应该珍视的情感。况且,人们产生感情和观察感情的器官是同一个。而这个器官的作用不可能是纯粹的和自然的。当你要用自己的智力活动观察自己的感情时,感情就立即消失了;因此,你要有意观察自己的感情,就得停止自己的智力活动,智力活动一停止,观察感情也就无法进行。这就产生了一种令人非常遗憾的现象:人类的感情常在没有固定下来的情况下流失掉了。而象张俊彪这样的作家(其实任何作家都是如此)不仅能承受奇异的苦难,体验丰富的人生滋味,而且能够迅速地捕捉到转瞬即逝的人类感情,给它一个恰当的词语,用词语将感情固定下来。这项工作的实质是给一种未经表述的情感命名,当然需要不凡的才气。在现实生活中,拥有丰富奇特的人生经历,品尝过复杂难言的人生滋味的人们绝非个别,而具有将这种经历和人生滋味衍化为文学的愿望更是普遍现象。然而,如前所述,许多人在现实经历与文学之间无法用语词作为中介,致使人类的一些极有价值的情感内容流失。将张俊彪的人生道路与他的创作相联系加以考察,总结其内在的规律,探寻他的艺术世界的特征和美学追求,就将会成为一笔珍贵的文学理论财富,给那些在文学的道路上努力的人们以实在的帮助和理论指导。

第二 文化意义。

文化和人结下了这样的不解之缘:文化是人在艰苦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它给了人们以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成为人类本质力量不断展示的真实而可靠的记录;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之后,又成为人类的创造背景和制约,决定着人

们必将以这种方式创造而不以那种方式创造,必将创造出这种文明而非那种文明。文化与人结下了这样的不解之缘,投射到文学创作中,就必然使那艺术世界烙上人类文化与人的怪圈的痕迹,它吸引着也困惑着作家和理论家们。对于张俊彪这样独特的作家来说,无论是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本身,还是他作为这个艺术世界的创造者,都既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又是一种极为丰富的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当我们将张俊彪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时,可以总结出西北黄土高原悠久的农耕文明中儒家文化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陕甘儒道文化圈内的陇东黄土高坡地区是黄河流域文化发源地,农耕文明的历史久远而深厚,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世世代代农民受着儒家文化年深日久的影响,这块土地有着自己的光荣和骄傲,也有着使世世代代农民喘息的沉重的包袱。这一切,通过遗传基因,也借助于“觅母”复制得以承接下来,成为这片土地上人们文化心理的特质,一次又一次顽强地体现出来。所谓“觅母”,是美国当代动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R·道金斯所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地球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复制基因——觅母(Meme)。如果说基因是通过遗传进化的机制而发挥作用的话,那么,觅母则是以模仿的方式进行自我复制。文化的传播就是借助觅母的复制得以实现的。张俊彪与这种文化形成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他是受这种文化熏陶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作家,这种文化的特质在他的艺术创作中以种种方式顽强地体现出来,例如他的《没有陨落的太阳》、《省委第一书记》等长篇创作中渗透的宽容心态,就是儒家传统文化的艺术折射。另一方面,张俊彪是位充满智慧的作家。智慧的本质就是适应,而每一个智慧活动都含有一定的认识结构。在认识的过程中,同化和顺应是个体适应环境的两种机能。同化是个体把客体纳入主体的图式之中,这只能引起图式的量的变化;顺应是主体

的图式不能同化客体,因而引起图式的质的变化,促进调整原有的图式或创立新的图式。张俊彪的成长过程,就是在不断地调整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因为有所调整,他的艺术世界时有偏离甚至反叛儒家文化的痕迹。总结上述两方面对造就一位作家的意义与其中的规律,就不仅有文学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文化学方面的价值。

将这一课题置于国际文化发展与现状的背景上,又会展现为另一番天地。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发展具有不约而同性。在经济水平、物质发展相当的各民族、各国家之间,文化也会出现不约而同的现象,这些现象同中有异,能够表明人类文化的互通性质。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与他的助手和学生爱克曼谈话时,谈到他阅读了中国传奇。他说,中国传奇“并不象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①同理,张俊彪这样以自己的独特经历和革命历史为主要创作题材,而且走自己迥异于他人的文学道路的作家,在其他民族国家中也曾出现过。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个典型的例证。就是法国作家普鲁斯特也有着与其相似之处。诚然,普鲁斯特是位从心理、文化、意识形态与张俊彪都不相同的小说家。但是有一点是极相似的:都极为珍视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普鲁斯特的小说是一个聪明绝顶、敏感到痛苦地步的人的经历。这个人从小就出发寻找绝对的幸福,他在家庭里、爱情中、

① 《歌德谈话录》第112页。